

嚴復——傳播西學的重要代表

張東寶*

一

嚴復(1853-1921年)，原名宗光，即崇拜東漢不事王侯的高士嚴光之意，字又陵，又字幾道，晚號愈野老人，福建省侯官縣(今閩侯縣)人。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學堂，畢業後在海軍任職。1877年被清政府選派到英國留學。1879年回國，後長期擔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、總辦等職。中日“甲午戰爭”失敗後，嚴復疾呼變法維新。1897年在天津創辦《國聞報》。“戊戌變法”失敗後，思想發生轉折，逐漸轉向傳統學術。後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、復旦公學校長。辛亥革命後，先後任京師大學堂校長、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、約法會議議員、憲法起草委員、參政員等。後參與袁世凱復辟帝制活動，為“籌安會”成員。1921年病逝於福州。

嚴復不僅是維新變法中的啓蒙思想家，而且也是中國近代系統介紹西學的大師級主要代表。其代表性論著有：《論世變之亟》、《原強》、《救亡決論》、《辟韓》、《嚴幾道詩文鈔》、《愈野堂詩集》、《嚴幾道文集》等。此外，嚴復還翻譯了西方的一些重要著作，如，赫胥黎的《天演論》，亞當·斯密的《原富》，約翰·穆勒的《群己權界論》、《名學》，甄克斯的《社會通詮》，孟德斯鳩的《法意》，斯賓塞的《群學肄言》，耶芳斯的《名學淺說》等。其著譯編為《侯官嚴氏叢刊》、《嚴譯名著叢刊》、《嚴侯官先生全集》、《嚴復集》。

1877年，一艘開往英國的輪船上，一位青年佇立船頭，遙望着西方的世界，若有所思。他心裏有很多疑問：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，今日何以淪落到受盡欺凌之境？西方國家，特別是英國，又何以如此富強？這位青年，就是傳播西學第一人的嚴復。嚴復之所以能獲得無數人夢寐以求的留學機會，不能不提及他少

時所受的傳統教育和洋式學堂訓練。嚴復父親嚴振先是當時的名醫，像當時所有的士紳家庭一樣，父親希望他能通過科舉成為達濟天下的儒官，於是在嚴復7歲時，將他送入私塾學習。嚴復的老師黃少岩很有學問，“漢學與宋學並重”。在他的教導下，嚴復瞭解了宋、元、明三代傑出思想家的處世態度和思想精髓。

正當嚴復沿着父親所希望的道路前進時，不幸父親病逝了！

失去經濟支柱的家庭陷入困境，嚴復只好放棄通過科舉進入仕途之念，轉而考入洋式學堂——福州船政學堂。剛進入學堂的嚴復內心充滿無奈和痛苦。令嚴復沒想到的是，在這裏所接受的教育會影響他的一生。他學外語，學西方近代科學，打下很深厚的根基。1871年，嚴復以優等成績畢業，被派到“建威”練習艦上實習；一年後，他調到“揚武”兵艦。在這裏，嚴復的學識和操作才能得到“揚武”艦英籍教習托萊西的高度贊揚，在他的幫助下，嚴復獲得赴英進一步深造的機會。

在英國，嚴復看到了它的繁榮發達，回顧落後貧窮的祖國，他陷入深深的反思。他認真考察着英國的政治、經濟和社會制度，對英國得以崛起的思想根源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，為求得答案而熱切地探索着……資本主義的政教文明在他腦海裏扎根，君主立憲、自由平等及達爾文、斯賓塞進化論思想，更是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兩年後，嚴復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英國海軍大學，回國後在船政學堂擔任總教習。1890年，嚴復成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。此時的嚴復，書生意氣，“往來於京津之間，朝之碩臣及錚錚以國士自期許者，咸折節爭集先生之廬”，他議論朝政，指陳時弊，往往鞭辟入裏，在封建士大夫中聲望越來越高。時人張自牧著《瀛海論》言中外情勢。嚴復指出：張自牧所論有四謬。張氏因兩江總督沈葆楨收購吳淞鐵

* 福建省老子研究會顧問

路加以拆毀，遂謂鐵路數年爲之不足，一夫毀之有餘，非中國所宜造，是一謬；次謂機器代人才，日趨淫侈，是二謬；又謂機器之利，後來必轉薄而更廢，是三謬。未謂中國有各國相互牽制之勢，海防非所宜，是四謬。張自牧爲當時思想開通人物，見解猶如此短淺，可見其時中國知識界之蔽塞。嚴復所云，今日視之，似亦並非特見，然在當時卻已超越一般流俗。

1894年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，向西方學習不到30年的日本，竟然打敗了中國！面對此種屈辱的局面，嚴復站出來向社會提出嚴峻的問題：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，中華民族何去何從？五千年文明古國面臨歷史選擇，一任固步自封、坐以待斃，還是改弦易張、死裏逃生？！

1895年2-5月，嚴復在天津《直報》上大聲疾呼，連續發表了5篇政論：《論世變之亟》、《原強》、《辟韓》、《原強續篇》、《教亡決論》。他把中西不同的文教、政治、道德及風俗一一對比，指出：“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”，“用西洋之術，而富強自可致。”此後，嚴復的活動重心由海軍界轉向思想界，開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之轉變。在此時期，他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譯著《天演論》，即赫胥黎的《進化論與倫理學》。但嚴復在翻譯此書時，只取了其中“進化論”部分，用英國哲學家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來代替赫胥黎的倫理學主張，同時又拋棄斯賓塞“聽天由命”的消極思想。採取了赫胥黎“與天爭辯”的積極觀點。嚴復翻譯西方著作(《天演論》、《法意》、《原富》、《自由論》等)之目的，很大程度上是爲了向國人發出祖國危亡的警告，於是他按照自己的意願，對《天演論》進行了大規模的取捨和改造，在書中，嚴復自己的按語竟然有1/3之多。在書中，嚴復宣揚“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”的生物進化規律也適用於人類社會，闡明中國若順應天演規律，變法維新，就可“自強保種”，反之則會“亡國滅種”，爲天演所淘汰。嚴復希望讓民眾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，激勵民眾鬥志，強調“變法必可成功”。

二

嚴復對中西文化進行了具體比較，認爲中西文化存在着明顯差異。首先，中西文化的道德觀不同：中國人主張“愛有差異”，西方人主張人人平等。他說：“中國最重三綱，而西人首明平等；中國親親，而西人尚賢；中國以孝治天下，而西人以公治天下；中國

尊主，而西人隆民。”其次，中西文化的經濟觀不同：中國人重視“勤儉持家”，西方則主張“勤勞致富”。他說：“其於財用也，中國重節流，而西人重開源。”再次，中西文化的學術思想也不同：中國人重視空談華飾，西方人注重探求新知。嚴復說：“其於爲學也，中國誇多識，而西人尊新知。”再次，中西文化的政治觀念也不相同：西方是民主制度，中國是專制制度。在嚴復看來，西方“以自由爲體，以民主爲用”，打破了森嚴的等級制度，掃除了忌諱的思想隔閡，“人人得其意，申其言，上下之勢不相懸隔，君不甚尊，民不甚賤，而聯若一體”。中國卻恰恰相反，君尊民賤，上下等級森嚴；因爲缺乏自由和民主，人人不得不噤若寒蟬。嚴復認爲，概括地看，西方文化是創造的、發展的；中國文化是守舊的、停滯的(對此論，吾不敢苟同也。嚴氏在爲友人杭辛齋著《學易筆談》作序時，說自己“素未學《易》”。而《易》則有“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”，“與時偕行”之說，豈可忘乎？)。他說：“嘗謂中西事理，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，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，西之人力今以勝古；中之人以一治一亂、一盛一衰爲天行人事之自然，西之人以日進無疆，既盛不可復衰，既治不可復亂，爲學術政化之極則。”

嚴復認爲，西學的核心在“崇真”、“爲公”兩個概念。他說：“敬扼要而談，不外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，於刑政則屈私以爲公而已。”所謂“崇真”，就是崇尚科學精神及科學方法，尤其重視經驗論的歸納法。所謂“爲公”，主要指自由、平等觀念及民主制度。嚴復特別推崇西方的天賦自由觀念論，認爲這恰是中學所忽略、欠缺的。他說：“夫自由一言，其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，而從未嘗立以爲教者也。彼西人之言曰：惟天生民，各具賦界，得自由者乃爲全受。故人人各得自由，國國各得自由，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。侵人自由者，斯爲逆天理，賊人道。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，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。故侵人自由，雖國君不能，而其刑禁章條，要皆爲此設耳。”在嚴復看來，“崇真”與“爲公”二者不是各不相干，而是相互聯繫的。他說：“且格致之事，以道眼觀一切物，物物平等，本無大小、久暫、貴賤、善惡之殊。莊生知之，故曰道在屎溺，每下愈況。”正因爲如此，“格物致知”的方法不興，會阻礙天賦自由觀念之弘揚；等級之“私”未除，也會貽誤民主政治之發展。他說：“格致之事不先，偏頗之私未盡，生心害政，未有不貽誤家國者也”。

在嚴復看來，造成中西文化區別的原因有兩個方面：其一，地理環境的不同影響了民族文化的差異。在嚴復看來，歐洲地形“華離破碎”，其地勢“利於為分而不利於為合”，不利於形成統一國家；中國四周環山繞水，其地勢“利於為合而不利於為分”，利於形成大一統的國家。因此，歐洲各國“各位君長，種族相矜，互相砥礪，以勝為榮，以負為辱”。長此以往，“始於相忌，終於相成，日就月將，至於近今百年，其富強之效，遂有非餘洲所可及者”。中國情況則明顯不同，其“大一統”的政治只求“禦四夷、綏百姓，而求所謂長治久安者”，且“凡其作民厲學之政，大抵皆去異尚同”。長此以往，形成了中國人只求謹守禮法、相生相養而不求富強的習性。其二，中國封建文化的影響過於深重，導致了社會發展的停滯不前。嚴復認為，長期的封建統治導致了中國社會生產力低下，人口增長過快，而且導致了中國社會的持續動亂。他說：“由於文化未開，則民之嗜欲必重而慮患必輕。嗜欲重，故亟亟於婚嫁，慮患輕，故不知予籌其家室之費而備之。……謬種流傳，代復一代。……積數百年，地不足養，循至大亂，積骸如莽，流血成渠。時暫者十餘年，久者幾百年，直殺至人數大減，其亂漸定。……二十四史之興亡治亂，以此券矣。”

嚴復批判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專制文化，主張以西學之長改造中學之短。他認為，歷朝歷代皇帝根本不是甚麼“天子”，其實只是“竊國大盜”而已。他說：“秦以來之為君，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。國誰竊？轉相竊之於民而已。”在他看來，惟有人民才是國家、天下的真正主人，因此，必須保障人民的主權，保障人民的自由，而民主制度則是實現這種保障的手段。他說：“苟求其故，則彼自由為體，以民主為用。”在向西方學習的問題上，嚴復不贊成“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”的觀點，主張“自由為體，民主為用”。他認為，體用是不可分割的，要採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，必須同時學習其民主政治制度。因此，中國要實現富強，不僅必須在政治上給人民以民主自由權利，

而且在經濟上要允許自由貿易、自由競爭。不過，嚴復認為，中國立即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還不成熟，只能暫時採取君主立憲制，實行“君民共主”。為此，他提出了“鼓民力，開民智，新民德”的具體改革方案。所謂“鼓民力”，主要指反對封建陋習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。所謂“開民智”，是指開辦新式學堂，發展文化教育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。所謂“新民德”，則是指設立議院，建立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，用民主、自由、平等思想取代封建倫理道德。

三

在經歷了變法維新失敗、辛亥革命、袁世凱稱帝等一系列事件後，嚴復從政治活動中“撒離”。此時的他，思想上趨於保守。在文化觀上主張回歸傳統，提倡以引進西學為前提，建立以儒學為主體意識的新時代的文化體系，實現中國文化的自我更新。

但嚴復的回歸並非要復古，因他始終對西學持肯定態度。他認為，任何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沉澱於民族心理，民族意識中，中國必須修古而更新之，以傳統文化為基點，以西方文化為參照，才具備可能性、可行性。中國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，不能拋棄自身特定的價值尺度和思維模式，要注意振奮民族精神，呼喚民族意識。雖然嚴復在一些主張上有一定的片面性，但他提出的這種中西文化融合觀點，對於我們建設當代中國文化有很強的現實意義。

總之，嚴復是個一位在中國近代史人佔有重要地位的人物。在國家面臨危機時，他主張引進科學、民主和西方文化；他也是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，儘管他後來回歸傳統，趨於保守，卻依然對國家命運和中國文化前途非常關注，提出了很多建設性意見；他第一次建立起一個中西哲學滙合、以近代科學為理論基礎的哲學體系，從中國思想發展史的角度看，嚴復不僅是一位教育家、翻譯家，還是一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哲學家和思想家。

註釋：

1. 程志華：《中國近現代儒學史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。
2. 黎澤濟：《文史消閒錄》，南昌：百花州文藝出版社，2002年。